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周毅之 自选集



周毅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周毅之
自选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毅之自选集/周毅之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6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第1辑)

ISBN 978-7-80729-636-2

I. 周… II. 周… III. ①政治学—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D0-53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2859 号

- 书 名** 周毅之自选集
著 者 周毅之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1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36-2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总序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江苏，地处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下游，千百年来，她不仅汇聚着奔涌不息的一江春水，更蕴育了代代学界巨擘。从言子、枚乘、董仲舒，到范仲淹、王艮、冯梦龙、金圣叹、顾炎武、王念孙、阮元、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再到柳亚子、顾颉刚、费孝通……一个个宛如耀眼的繁星，辉映在历史的长空，汇聚成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正因有了众多学术大家和他们的创造，江苏被世人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堪称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江苏学人秉承前辈优良的治学传统，孜孜不倦，奋力勉耕，创造了大量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谱写了上个世纪后半叶江苏学界辉煌夺目的篇章。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与学术精华，当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自1999年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用5年时间，组编并相继出版了《当代江苏学人丛书》。该丛书以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苏籍著名学者为收录对象，多角度、较全面地反映他们的家世生平、治学经历、学术成就、道德修养和生活情趣。这套由近50部书组成的学人丛书，不仅成为弘扬江苏人文精神，展示文化强省建设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收录的对象大多已经辞世，少数健在者也都过了古稀甚至是耄耋之年。面对如此状况，有人不禁会问：曾经群星耀眼的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会不会后继乏人？让我们颇感欣慰的是，当历史跨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回应实践对理论的急切呼唤，进一步繁荣发展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社科界一批中年学者承继着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继续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并

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或着眼于对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或着眼于对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历史追寻;或潜心于精深的学理探析,或专注于相关学科理论的系统爬梳。其思想观点之丰富,学术见解之深刻,理论原创性之显著,令学界刮目。可以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一批学术带头人正在崭露头角。面对这一喜人的局面,在我的提议下,2009年初召开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编辑出版《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的决定。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实施的“人文江苏系列研究”工程的重要项目,计划用5~8年的时间,出版数十部。这套丛书与前述那套丛书有所不同,她是以现今活跃在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为收录对象,以“自选集”的形式选编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 or 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体,这些论文应当能够体现其研究的学术成就和水平,曾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所属领域的学科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同时介绍他们治学的心路历程、经验体会以及收录他们全部论著的目录。组织编辑出版《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既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当今江苏学人的成果和风采,也是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还是展示近些年来江苏文化大省和社科强省建设的成就。

诸事成功,人才为基。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局面,创造哲学社会科学新的辉煌,星星点点的学者群体显然力不从心,而是需要愈来愈多的社科工作者凝心聚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热忱点燃智慧的火炬,实现科学文化一代接一代的薪火相传。正因如此,我们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相对长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套丛书推介这些学界成功者的学术品质、治学之道和人文精神,给后学带来深刻的昭示与启迪:面对异彩纷呈的商品世界,只要我们不为物欲所动,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凭着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一腔赤诚,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开拓更加缤纷璀璨、洋洋大观的学术天地,一定能攀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峰巅。

浩浩江流,前浪后浪。我们不仅仅期许有更多的学者和他们的成果入编丛书,而且格外希望在各种学术活动中不断增添新面孔,汇聚新生力量,壮大学术队伍——也许江苏新一代学术大师就在他们中间诞生。

洪银兴

2010年1月

关于政治解放的当代追问

(代学术小传)

在政治学思考中,我非常敬重马克思用“政治解放”这一范畴表述造就近代民族国家的民主革命的成就。尽管这场革命所实现的解放依然是政治的,是“政治天国”的,因而是抽象的和形式上的,但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中无疑是一个解放意义上的重要事件。直到当下,这一政治解放故事仍在继续演绎着新的纷繁情节,并引起人们一再为这一故事中的情节逻辑作出合理性论证。但是,在生活真实的泥沼里所发生的情节却呈现出另一种逻辑,这里的众生相从各个侧面不断向那种天国里的形式满足扮着鬼脸。生活反复诘难着形式理性,这种诘难一再勾起我关于政治解放当下故事的追问。此中主要有三:其一,仍可归在政治解放名义下的当下故事情节是否改变了以往的逻辑特性?其二,在当代意义上能否继续坚持超越政治解放的申明和何以能够超越?其三,在历史的非线性观察中,中华政治文明传统为当下中国政治发展准备了什么?这些问题常使我寝食难安。事情明摆着,必须捍卫虽然只是在形式意义上但仍应珍惜的文明成果,同时必须坚持探索超越形式的满足并从形式走向实质,这在理论和实践都实属不易,而在情况特别复杂的世界背景和国情条件下,更会常常处于一种两难境况。以我有限的思维能力,实难堪此重负。但我自信仍然努力追寻,明知“路漫漫其修远”,依然“上下而求索”。尽管日常事务占去很多时光,有时有一天赶四五个会场的境况,仍不敢稍有懈怠。我属牛,就像牛一样干活。

政治学思考在我的意识中心，始终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尤其是当下中国的政治文明。上世纪80年代，我所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国政治的传统根基。在这一话题中，我甚至还以楚汉之争为背景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当时我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手段，从祖宗崇拜的观察延及君主崇拜，琢磨上古“记忆”中的共同体生活基因。在此“记忆”中，万民一切福利，包括火、房、舟、车、农耕、作牧等等生活中所有主要器物与技术都是“怀保小民”者所发明和赐予。恩泽被于四方，万民望风而从，即所谓“庶民子来”，便是天理。但是，按此德者即获正义认可的逻辑，绝难理解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火与文明，却遭到主宰者的残暴惩罚。我在上中学时就对这一惩罚百思而不得其解。虽然说宙斯有私心，但私心却可以以正义的名义行事，因而不得不追问正义究竟是什么。原来在希腊神话的逻辑中，正义主要并非恩泽，而主要是秩序。神带给人类的主要不是恩泽，而是秩序和规则。秩序和规则呈现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形式。在西方，普遍主义的形式才是真正的“神意”。人类的福利应该由人类在秩序规则的范围内自己去寻找，而非来自主宰者的恩泽，主宰者恩泽的扩张乃是对规则的违犯。这种对普遍性的形式的崇拜，在对政治文明的思考中是不能无视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更不用说当下世界日益“连成一气”，素来以兼容万方、汇于一炉为民族生存荣耀的中国更应关注这一文明的当下成果。但是，事情又并非如读书人时常所想的那么简单，在当下世界，横亘着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方式自由民主已经终结人类历史的强势论证蔓延全球，大有逼我就范之势。既要兼容万方，又不能束手就范，就必须冷静地审视一下站在身边儿的是何等样人物。所以我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话题，并以对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反思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由此渐次展开各个层面上的思考和对话。就此话题所发表的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基本代表了这个时期思考的积淀，论文之外还有一些专题在高等院校及境内外学术机构中作过交流。有一点需要说明，此间发表于境外的英文论文是出于家内子严翊君教授的译笔。

在这一领域中的思考，我始终贯彻一个方法论原则，即坚持生活真实在政治观察中的优先性。因为以政治解放的名义所实现的一切成果，都包含着形式与实质的对立，只要这种形式与实质的对立不消除，一切政治设施无论在形式论证中具有何等完满的合理性，都依然只是形式的，只是存活于“政治天国”的，只是“被真实地想象”着的。以这种形式的满足宣布为人类生活的极致，实现着“历史

的终结”，充其量也只是弥赛亚们带给人类的“应许之地”。所以，在政治学观察中，我尽管常常首先从西方民族国家各种说明形式的合理性逻辑入手，并且在这种合理性逻辑中发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但绝不停留于此。我的本意并不在揭示这些合理性说明中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而在于说明生成所有这些政治现象、包括形式论证中的矛盾和冲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的确定性来自生活实践。所以，在为了观察 20 世纪以来政治生活形式及其理论说明，因而不得不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流变作一梳理的时候，我清楚地发现，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变迁所决定的过程，是这一生活主题变迁对国家合理性论证实行选择性干预的过程。当时我必须从头开始工作，对西方民族国家从胎动于封建军事专制国家开始，直到当今时代的全部意识形态作一全面回顾，发现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西方民族国家自始至终以合理性范畴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用普遍主义的合理性为自身的合法性作说明，以期从合理性方面获得社会的合法性信念和对其权威服从的认同。这种寻求合理性论证的过程，一开始就是高扬理性，用“理性王国”取代“神性王国”的过程。第二，西方民族国家寻求合理性论证的过程，不是一次终结的，而是代代嬗变的，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合理性意识形态，并且需要不同的说明方式为其范式工具。尽管合理性有其共同特性，但实现合理性说明的范式呈现为一个流变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阶段：在革命时期为伦理合理性论证，在制宪时期为功利合理性论证，在管理时期为技术合理性论证。此中，伦理合理性论证是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正义性说明，功利合理性论证是服务于夺取政权后权力分配的规则说明，而自 19 世纪末开始并贯穿于 20 世纪的技术合理性论证则是服务于权力所有者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有效管理。由此可以看出，所有论证范式的变迁都来自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而实行的选择性干预。在这里，要把握理论事件，首先要把握生活事件，生活事件是理论事件的基础性铺垫。在我面对关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各种理论事件时，深感这应该是观察和理解政治学成果、特别是当下成果的一个重要视角，是解开许多云嶂雾绕的论证谜团的一条路径。

当然，在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全部进程中，我所关注的主要点只能是当下的理论事件，集中在 20 世纪以来。经过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交替，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已经获得了稳固的统治秩序，政治生活的中心课题转向如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家们所表述的，如何在宪法框架内更加有效率地实施公共管理。这一政治生活主题的突显，也与大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市场力量过度膨胀并越来越难以驾驭的现象相联系。即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美国到了需要一

个“总管家”的时候。塔尔科特·帕森斯就是这样认定政治是“社会组织(在‘宪法的框架内’)起作用的方面”,国家只是一个提出“集体的”目标并动员社会去实现的“集体”。而麦肯齐则视奥克肖特的政治定义为英国最普遍的定义,即政治是“参加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的过程”。在这个时候,即如韦伯所描述的那样,国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的技术合理性被提到最优先的地位,这时候的人们关注国家的总体理性形象,是以一种貌似纯科学的态度来关注它的技术功能。这一政治生活主题造就了资本主义政治史上、甚至也可说是欧、美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型国家”、高踞社会之上的“技术巨灵”,实行着史无前例的“技术集权主义”。即使到20世纪晚期,这个“技术巨灵”遭遇严重危机,新理性主义者重新提起“正义”话题,新保守主义关注国家的价值独立性、连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学理传统,但是用超越性的纯净科学的态度来说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式没有变。所发生的明显调整在于两点:一是把原先作为政治学对象的技术化观察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用经济学的抽象普遍性工具来承担对于政治学对象的技术合理性观察。二是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在管理意义上的内部秩序关系局部调整,把“正义”理念从19世纪曾占据主导话语地位的伦理学含义移向实证理念中的政治学含义,为新的权力关系格局创设一个超越性的“多元的完备理性”,因而具有普遍技术政治意义的论证。这实际上是“正义”理念的一次技术合理化论证,或者说不仅在公共管理上,而且在政治层面上重新阐述了技术合理性意识形态。关于当下政治,我首先面对的就是这种论证中的技术政治巨灵。

众所周知,在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在被这种技术合理性充分论证了的技术政治巨灵的旁边,始终站着一批对之实行价值批判的学者。甚至对之实行过完备论证的韦伯,也时常为这种“钢铁外套”式的非人格秩序而陷于苦恼,视之为“无生命的机器”、“灵魂的分割”。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观点时,就已经常常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的工作决不停留在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所抱持的态度,仍然如前所述,要把握理论事件,首先要把握生活事件;要有来自理性对理性的批判,但更根本的是来自生活对理性的批判。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冷峻的话题。

价值批判者们,尤其是人学批判者们的批判,牵动着人们的怨怒,我并非无动于衷。我当然反对“灵魂的分割”,深知韦伯式苦恼的内涵。但其实,生活中的事件远非如此简单。批判者们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自觉不必总是重复着这些无休止的怨怒。可以说,当下不少“现代性”批判论者还仍然停留在这种怨怒之中,这于情可以理解,于事则难有裨益。重回原来的话题,我所做的思考主要是

指出,“灵魂的分割”并非来自理性本身,而是来自生活事件的干预。比如,人们对韦伯所论证的非人格秩序的神话的不安,只是一种理性完备性层面上的不安,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的悖论而产生的忧伤。在生活的真实当中,技术政治巨灵并非因韦伯而从神灯中被释放出来,也并非如神话中的巨灵那样特立独行、法力无边,甚至其只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当这一巨灵的诅咒者在抨击坐拥“官员统治”的官僚制独立性即默顿所谓的“群体稳固性”时,生活中的情节却是“官员被统治”、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当诅咒者们一再痛斥非人格秩序权威对人性实施“灵魂分割”时,生活中的情节却是这种“钢铁外套”其实只是社会某些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显示身份的政治礼服,是拥有这套技术工装或合身礼服的人对其他人实施着“灵魂分割”。人们首先是不知不觉间被韦伯引导着把非人格秩序权威“真实地想象”出来,并使之神话化,然后再对这一神话造就的异化实行否定。思想中的逻辑是完成了,但在生活中却不被理睬,因为生活中的秩序权威的非人格特性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想象”。当然,之所以被“真实地想象”,恰是因为这种“真实的想象”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甚至是必然的,因为这种技术合理化神话为俘获并役使政府的人提供了华丽炫目的礼服,并利用对其“独立性”的批判更有效地强化着这种俘获与役使。这便是事实,我要做的首先是指出这一事实。我在相关这些话题的论文中,言辞可能刻薄了些(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刻薄的人),但绝无不尊重他人、他论之心,我只是说实话,想说就说。

上述思考,形成了我对政治学西方事件的基本立场。因为这些思考大多集中于上世纪90年代,所以也可说是在特定视角下对20世纪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小小的盘点。而在世纪之交及其后,许多日常事务把我缠住,我也自己以为“盘点”后当有一个“学术喘息”的时期。其实不然,我天生缺乏“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淡定,读到、看到一些事,总是心神不宁。在世纪之交,思想家们、包括国内不少的学界同仁又像当年韦伯赤诚地论证科层制合理性一样,一往情深地叙述以治理学说、善治理论为代表的新学说的合理性,视之为更换科层制“钢铁外套”以及更换因市场失败而备受牵累的诺齐克式“最小政府”设计的最佳选择。由于这一理论放弃了政府与市场对峙关系的传统视野,引入了“第三方”即引入了社会范畴,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倡导“还政于民”、公民自治、社会自组织体系、第三部门发育、谈判共识、“无形协议”以及谈判共识的制度供应等,因而看上去确是一件取代“钢铁外套”、颇具飘柔特点的新外套。

当时,我琢磨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资料,从全球化、巨型跨国公司、世界银行、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内部多元价值群体、令人心酸的现代社会病等等生活事件所

构成的反光镜中观察治理学说、善治理论，反复品味创制者的原始意蕴，渐渐发现这些理论“新外套”里的故事依然似曾相识，还是老情节。这些理论的重大特点是在政治构思中引入社会范畴，并坦然认可社会中存在着多元价值主体，然后就通过“元治理”提供的体现权利平等、程序正义的制度供应，达成谈判共识（“无形协议”），实现治理中的合法性。在这里，即使把后续环节中的诸多悖论略去不论，仅在最基础层面上首先就遇到“元治理”困境。因为“元治理”所提供的制度正义，其实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理性预设。这里的权利平等、程序正义，有如罗尔斯“无知之幕”中的生成物一样，不过是一种超越性的形式满足（特别要指出一个最具讽刺力的事实：在现代社会中，霸权价值的实现最需要的、最离不开的正是这种形式满足）。在思想者那里，形式中的故事情节总是这样安排的，即“先定规则，后分牌”；真实生活中的情节则恰恰相反，是“先分牌，后定规则”。因而在事实的世界里，“好牌”的拥有者同时也拥有规则制定的优先权，拥有在规则谈判中的话语霸权，拥有主导“元治理”制度供应的实际资格。思想者们总是寻求形式上权利平等的满足，在治理的逻辑链接中寻求基于“反思的理性”、基于“交往和理解”而形成的谈判共识，由此来消解原先政府自上而下的专横，消解固有的市场外部性困境，实现社会、政府、市场间的和解。应该说，承认价值重叠、崇尚“反思的理性”、尊重谈判共识，较之于技术合理性、公共意志、科层制这些“钢铁外套”确实要有感情色彩，显得华丽而宽松。但是，在这件华丽而宽松的外套里，真实的故事仍是原先的情节，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总是能够利用对价值重叠的承认来强化自己的价值优势，总是能够利用对“反思的理性”的崇尚而一再迫使弱势群体妥协，总是能够利用对谈判共识的尊重巩固已经注入了自身价值取向的契约的权威。当思想者们在国家、市场的序列中引入社会范畴，强势集团则实际操控着真实的社会；当思想者们描述着社会自组织体系，强势集团则实际把持着社会自组织体系；当思想者们谈论着“对相互保证安全的广泛协议和预期”，强势集团早已自诩是“相互保证安全”秩序的实际恩赐者。难怪一向强调自身不介入主权国家内部政治事务的世界银行极力倡导善治理论，倡导全球治理学说，却又把善治理论政治化为一种具有霸权色彩的尺度，使之成为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主导政策思想，成为评估受援国条件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倡导善治的国际权威机构以善治的名义实施着霸权，善治在这里遭到了可怜的嘲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依据治理原则设计的制度环境，那也不得不警惕现代巨型公司以社会的名义实际俘获本国政府，又役使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得不警惕一些巨型国际经济或社会组织以社会的名义超越别国主权，实际实施着某些大国的霸权意图；不得不警惕一个国家内部坐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

的不对称谈判,或以“为纳税人服务”的名义,实际实施着社会强势集团和政府的利益捆绑;不得不警惕话语霸权的实际拥有者以共识的名义迫使其他社会群落一再作出妥协。说实在的,我这样提出问题,并非无根据的“杞人之忧”,也并非存心和哪个理论过不去,甚至我还认为治理学说在公共管理方面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但是我不能盲目附和,应该说实话,尤其是该给人们提个醒的地方不能不提个醒。

回顾这一段思考的历程,我自感没讨得什么巧。坚持生活真实在政治观察中的优先性,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走起来很苦,远不如换个“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来得松泛和自如,更不如穷家孩子夸富家理财经验那样特能吸引人的眼球。在当下的理论故事圈里,不敢说已经结束了“用词句反对词句”的情节。企求通过各种词句的“解构”使现代国家“碎片化”的,依然不绝如缕。但是,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哲学云端里的故事,风吹云去,地上的山还是那座山,地上的水还是那条水。在当代政治的思考中,不能仅是站在哲学的云端来反对现实的陆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学问家们不可不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站稳了,才能有底气谈论享有政治解放的文明成果和谈论对政治解放的超越。

二

关于20世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追问的后续问题,首先就是在当代意义上能否坚持超越政治解放的申明和何以能够超越。这实质上是一个关于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前面已经说到,上世纪90年代我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话题,其本意仍在于中国,在于世界里的中国,在于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国独特的发展之路,尤其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

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但也极富挑战性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这个问题上的责难之声几乎如影随形,至今仍不绝于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以经济业绩令世人赞叹,连长期自视为对手者也不能不瞠目于当下情景,以致在非技术层面上—时无从发难。因而责难者的矛刺所向,主要是集中在政治发展,据以责难的主要尺度便是“西式典范的自由与民主”,其主要涵义即马克思所界定的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制度成果及规则。在这些责难之中,有森严的意识形态屏障所引起的种种偏狭,有不绝如缕的冷战思维所留下的解不开的情结。但于我们自身,也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没有理清。对手的矛刺所向,也许就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因而学人之中,有视之为畏途,绕道而行;有因风起帆,只满足于做些意识形态烘托的工作;也有激愤者,意气所指,发泄为

快。而在我,实不敢学如此作派,审慎持重,士之本心。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长期在这个领域中作观察与思考。而在所有这些观察与思考中,处处都遇到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 20 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中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这个阴影常常会折损社会主义在超越政治解放方面所作努力的自信心。邓小平对此作过一个概括,他认为解放以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2 页)。他举毛泽东为例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因此,“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3 页)显然,邓小平在这里陈述着 20 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时,以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不成熟,乃至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这样的阴影总是压在心中,再加上当今世界的制度成果仍主要是以政治解放为基本含义的制度成果,并处于强势状态,而我国又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绕不开的选择,而市场经济又总是发出形式平等驱逐事实平等的政治隐喻,此三重因素构成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使超越政治解放的言说遭遇种种困难。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我总是告诫自己:得沉住气。如果放弃对超越政治解放申明的坚持,那就是在西方式制度成果中被迫就范。关于这种西方式制度成果究竟是怎样的,当时我不敢凭道听途说就随声附和、不敢望文生义而妄加揣测。所以,如前所述,上世纪 90 年代我一度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西方政治生活合理性论证的各种言说,观察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各色事件。此间的工作坚定了我的一个看法:政治解放只是形式的解放,并未解决塞拉西马科斯对苏格拉底所说的“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个千年难题;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进步,但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极状态;应该享有政治解放的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如果丧失对于超越政治解放的自信,那就会在西方式制度框架中遭到捆绑。由此,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在思考如下几个基本方面。

其一,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人类的成功选择。对超越政治解放的自信,说到底是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自信。对此,在 20 世纪末的一些人当中有明显的不乐观

色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不敢充分肯定。这里需要的不是训导,而是理由,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说明。我把 20 世纪的宏观进程分作三大场景,一是危机和战争,二是战后大繁荣,三是晚期困境与震荡。在第一场景中,是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走出危机的调控理念,同时也是成功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蹂躏的决定性力量,甚至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救下它的死敌一命”。在第二场景中,是社会主义为广大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工业化提供了政治环境和政策基础,也为发达国家战后繁荣输入了政策理念。在第三场景中,新的危机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低潮,但是资本主义对困境的解决并无灵丹妙药,走出困境(甚至包括 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仍然不得不引入社会主义的政策智慧。因而可以说,社会主义参与了 20 世纪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作出了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贡献,可以毫无愧色地说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人类的成功选择。当下的生活事实仍然在证明,社会主义在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所难以解决的人类困境问题和争取人类文明进步中展现自身生命力。超越政治解放的自信,首先就是基于对历史的这一宏观把握。

其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并不证明“历史终结论”。诚实的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困难的话题,我明白自己必须面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而当时的西方学界,当然也包括政界正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西方政治理念的普遍价值,论证历史演进的“走向完成”、论证西方式自由与民主理念如何实现了历史的终结。即使到新世纪已走过近 10 年的今天,尽管“应许之地”的夸张式表述连福山自己也渐生疑虑,但是仍有不少人把对政治生活的观察框架定格在这种表述的终极性上,至少视之为当下的典范模式。所以,当时我不得不极为认真地审视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包括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失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20 世纪晚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挫折和失败的东西,其实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词句包装着的落后的传统社会机制,或者说是强迫幼稚的社会主义背负着的落后国土上的沉重历史包袱,是列宁所意识到的俄罗斯所存在的“低于资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东西。所以,这些挫折和失败虽然毁损了社会主义的名声,却并未毁损社会主义的真谛。政治剧变使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但也使社会主义终于摆脱了充斥传统社会“辉煌垃圾”的沉重历史包袱,重新赢得了自身。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社会主义终于走完了在落后国土上行走的“幼稚阶段”,走出了一段历史阶段上的“炼狱”,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义在这一段“炼狱”中的行走,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价值的永恒性提供证据,进入新世纪头一个十年就遇上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对此作了说明。

其三,超越政治解放应该包括对政治解放文明成果的享有。这应是一个在历史辩证法视域中把握的命题。旧中国没有真正享受政治解放的成果,新中国因为革命意识的极度强调也几乎拒绝思考对政治解放成果的承接。于是,在中国这块特定土地上以实现超越政治解放为规定性的政治发展实践,就发生了对政治解放成果的政策立场问题。如何把握这个政策立场?我在完成“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的规划课题时,反复研读邓小平从根据地时期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前后达半个世纪中的各种论著,反复比较分析了各种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清晰地看到有一个在政治建设意义上“从世界各国吸取进步因素”的思想线索。他把缺乏民主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和锻炼,甚至搞“以党治国”视为国民党的不良传统,视为“最大的蠢笨”。他在肯定的语义上讲述社会主义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得到解决,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由此我领悟到,在邓小平的思考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政策立场:以超越政治解放为规定性的中国政治发展,历史性地包含着对政治解放文明成果的承接和享用。

在思考这个政策立场的问题时,我深感一种哲学立场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超越政治解放中包含对政治解放文明成果的承接与享用,这需要一种历史批判上的更高立场,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遍性公民。由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政治解放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要消除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以实质的名义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等形式规则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所以,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承接和享有政治解放成果,

既是一种政策立场,又是一种哲学立场。

其四,超越政治解放从革命操作走向文明积累。超越政治解放如何成为现实的社会行动与成果,这在社会操作上至少应包含两个基本事项:一是在权力归属的意义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民主”;二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上创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系体系和公共生活的文明方式。我称前者为革命操作,称后者为文明积累。由此来观察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就可以看到,人们在革命操作上投注了主要的精力和更多的注意力,而在文明积累上却疏于关注,留下了不少急需展开画图的空白地带。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找寻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对政治实践关注的重点取向。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阐述政治解放时包含了许多关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的、有益的部分”,但这些部分与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对 19 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因而理论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危机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上。这样,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批判的主题日显突出,并逐渐占据了理论的主导视野。这种理论注意力的转移,是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关于民主的阶级属性分析的主题优先性、对资本主义民主否定的优先性这一理论习惯的先期原因。这种以“两个优先性”为特征的理论习惯,在后来的革命背景中一再受到激励,从而走向极端并成为后来从事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和理论工作的人们在观念上的一种包袱。这种观念上的包袱使通过革命而“争得民主”的人们常常陶醉于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优越感,而松懈了政治文明积累和进步意义上的建设性努力,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

另一项工作是观察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过程的演变特性。这一过程变化表明,革命操作方式的惯性力量传入政治建设之中,对文明积累过程产生了负面影响。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落后国家发起的冲击。在专制传统深厚、小农像汪洋大海一样存在的国度里,实现革命必须启动传统的权威手段,主要包括超越法制的暴力、集中制的权威组织、意识形态灌输而发动的群众运动等等。在落后的国土上,没有强大的杠杆,便不能撬动巨大的石块。所以这一强大杠杆的选择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是极为成功的。然而,巨大的杠杆有时会带来巨大的惯性,成功的经验有时会被教条化,从而导致政治建设实践中依然保留了对传统权威手段的过度崇尚,包括对暴力的过度肯定、对国家强制力职能的过度强调,对集中制乃至个人权威的过度尊崇,对“政治动员”的过度依赖和对行政统制方式的不恰当的颂扬等等。这显然给文明积累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带来了

负面制约因素。在这样一个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演变的总图景下,我清晰地看到了邓小平所作的卓越贡献,那就是突破这种负面制约因素的束缚,推进超越政治解放在文明积累意义上的实践进程。我由衷地敬佩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建设的贡献,这也是他对超越政治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贡献。我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主题上。

三

粗略回顾了上世纪 90 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约 20 年里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心路历程,再重新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前面已经说过,政治学思考在我的意识中心,始终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上世纪 80 年代特别关注过中国政治的传统根基。当时有一个对传统文化作反思的热潮,尽管各色言说各存其心,但热门的取向似乎是重启“脱亚入欧”、“脱中入西”之说。我深知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礼教杀人”之弊,但是全部传统却并非一句“礼教杀人”就能完全概括得了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能历久弥新,虽历尽风雨坎坷而能生生不息,必有其存在的道理。尤其令人生疑的是,满地球那么多人,难道命中注定都要按照欧洲式理性政治的设计来生活吗?或者说,如果不按照这一设计生活,就注定要被“开除球籍”吗?各个文明群落自有构思自身生存图景的思维方式,难道最终都注定要按欧洲式的理性传统来“统一”思维模式吗?如果把问题阈再放宽一点,人类的各种文明历程异彩纷呈,是否都服从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思维中的线性过程?如果是,那么理性是否是在执行着上帝的功能?如果不是,又何必把满世界的人都往欧洲式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上硬塞?这些问题一个个地敲打我,回到主题,就定格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非线性观察视域,那么在这个视域中,对政治解放的超越是否一定是按照政治解放的原初叙述逻辑所安排的线路才能够实现?由此变换一个表达方式,那就是,如果人类文明进程并非一个理性安排的线性过程,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境域中超越政治解放就应该而且能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于是问题就转向这样一个方面:如果超越政治解放在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中华政治文明传统又为这种超越作了哪些准备,提供了哪些构筑自身特性的基础质料?

这个话题就是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撰写《周恩来的行政哲学》时所关注的主要之点。当时对问题的把握并未如今天这样清晰,当时的立意是以周恩来政务活动中的哲学理念为案例,探寻中华政治文明传统中有哪些是具有当代价值的基础质料。当时,我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西方世界中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